

中国首次全面系统揭示谶纬
神学与古代预言之玄妙奥秘

谶纬神学与古代社会预言

预测术

解祈



庚
子

易 玄 著

卦学与古代社会预言 预测术解析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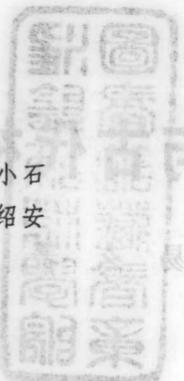
204341952

己卯
易 玄

吉 記 紋 學 本 學 輯 卷 鑑

责任编辑：黄小石

封面设计：文绍安



谶纬神学与古代社会预言

易玄 著

巴蜀书社出版发行

成都盐道街三号 邮编 610012

总编室电话(028)6656816

发行科电话(028)6662019

新华书店经销

成都市老年事业印刷厂印刷

成都市二环路东二段三十一号

开本 850×1168

1/32

印张 16

字数 370 千字

1999年9月第一版

1999年9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3000 册

ISBN7-80659-001-3/B·116

定价：26.80 元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工厂调换

版权所权，翻印必究

得才者勝

識練

北宮生上

鄭子歸
唯曰
北宮

歌思任

自增其三歲
而
謂
十
年

此出所生
邦和公興
吳文暇
與在大聲
上卿
艺不職
一月長此

434195

谶纬神学与古代社会预言



著者

吉川会津古已学研出版社

ISBN 7-5350-0607-8

定价：25.00元

书名：《吉川会津古已学研出版社》

出版时间：2000年1月

平装

印数：1—1000

印数：1—1000

吉川会津古已学研出版社

定价：25.00元

书名：《吉川会津古已学研出版社》

出版时间：2000年1月

ISBN 7-5350-0608-6

书名：《吉川会津古已学研出版社》

吉川会津古已学研出版社

出版说明

人们生活在社会上，所见所闻，种种社会政治的腐败，人心的险恶，命运的风云变幻莫测，生死病痛的凄楚，情感的折磨……都使人需要某种虚幻的预言启示，以寄托避祸趋福、去苦寻乐的希望。这是人类自存在以来就有的社会心理，是各种预言能经久不息地产生、存在的社会基础，是一种值得研究的人类文化现象。

中西社会发展的不同，预言也有所不同。数百年来，西方最有影响的预言家当数诺查丹玛斯，他在四百多年前所著的《诸世纪》，至今仍有着世界性的影响。而对中国影响最深远的预言，当推谶纬神学。不了解谶纬神学，就无从真正懂得中国社会流行的各种预言。

那么，什么是谶纬神学呢？简单地讲，谶纬神学就是专讲预言的学问。中国历史上被誉为“术数穷天地，制作侔（比）造化”的大科学家张衡曾经指出：

立言于前，有微于后，故智者责焉，谓之谶书。

——《后汉书·张衡传》

先立一言，后来得到证信，这正是预言的特征，而谶书就是讲这类预言的著作。所以，说谶纬神学是专讲预言的学问，是完全有

所根据的。

当然，谶与纬也有区别。谶书多托名神仙，如赤帝、苍帝、黑帝、白帝、赤精子等等；纬书则相对于经书而言，托名孔子，但纬书的孔子也是神怪，因而，谶纬所讲的预言都是神的预言，这也是人们将谶纬称为谶纬神学的原因。

从历史上看，谶纬神学虽仅在西汉后期至东汉为官方承认的社会主导思想，但从其源与其后的流来看，谶纬预言在整个中国古代社会都一直盛行。

先秦时期的巫卜及各种预占，是谶纬神学出现的源头，而西汉盛行的天人感应、阴阳五行学说又为谶纬神学的出现提供了直接的土壤，西汉后期社会的动乱则是直接的催化剂。其后，各种预言如各个时代流传的谶语、推背图、乾坤万年歌、丙午丁未之厄等等，都无不是谶纬的流变，就连佛教、道教的宗教预言，也多少受到谶纬预言的影响。

本书试图从谶纬预言之源开始，直到谶纬流变的典型代表形式、经典著作，进行历史的全方位剖析，以使人们了解到谶纬预言的基本内容。自然，这种剖析是理性的批判性的，以使人们对谶纬预言这一中国传统的重要内容有一正确的认识。

书前用黄开国研究员的《论汉代谶纬神学》作为代前言，该文发表在权威的《中国哲学史研究》1984年第1期上。文章发表后，《中国哲学年鉴》曾专文介绍，又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全文转载，香港、大陆一些学者的专著也多次引用该文，因此是一篇了解谶纬神学的有价值的学术论文。

本书史料涉及上百种古籍，前人集中于《太平御览》等类书中，本书直接取材于《太平御览》等，未作史料的校勘，故个别文字与原始出处有异，特予说明。

育全宝县，同半知音题特表是学林典故，山词。敬著前育全类好

论汉代谶纬神学

代前言)

谶纬神学是汉代的一种社会思潮。谶和纬的含义是不同的。谶具有应验、灵验之义。《说文》曰：“谶，验也，从言，谶声。”可见，谶的本义是应验，它是同人的语言有关的。凡是有应验的预言，就叫做“谶”。宣扬这种宗教预言的书，就叫做“谶书”。张衡说：“立言于前，有徵于后，故智者贵焉，谓之谶书。”（《后汉书·张衡传》）纬是什么呢？《说文》曰：“纬，织横丝也。”织布上的横丝是纬的本义。因为织布上的纵丝称经，纬相对经而言。因而，用神学观点来解释经书的书，被称作纬书。汉代儒学有“五经”、“七经”之说，纬书也有“五纬”、“七纬”之称。

讖与纬虽有差别，但都具有十分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。讖书作者托名于天帝、神仙。汉成帝时甘忠可制造讖书，托名赤精子，说是“上帝使真人赤精子，下教我此道。”（《汉书·李寻传》）王莽时，哀章在铜匮上所造的讖文，其一托名“天帝”，其一托名“赤帝”（《汉书·王莽传》）。当时有的讖文还托丹石、三能文字、铁契、石龟、文

圭、玄印、石书、玄龙石、神井、大神石、铜符帛图等(同上)。谶书作者为增加神秘性,还在谶书中配有古怪的图画,因此谶书也叫作图书、图谶。纬书托名孔子,孔子本来是春秋末期儒家学派的创始人,但在谶纬中却被描绘成“前知千岁,后知万世”(《论衡·实知篇》)的神人。谶语有“孔子作《春秋》,为赤制而断十二公”(《后汉书·公孙述传》)的说法。汉自称继尧之后,推五行终始属火德,色尚赤。赤制就是汉制,西汉正好十二代皇帝。孔子在大约三百年前就预先规定好了西汉历史的发展,这不是“后知万世”的神人吗?《孝经·钩命诀》还将孔子的形貌描绘成海口、牛唇、舌理七重、虎掌、龟脊、辅喉、骈齿。班固在《典引篇》中说:“夫图书亮章,天哲也;孔献天命,圣孚也。”(《后汉书·班固传》)可见在谶纬神学盛行的东汉,人们心目中的孔子已经不是“人”,而是通天的“神”。纬书也有图画,七纬中有《稽览图》、《坤灵图》、《演孔图》、《保乾图》、《握诚图》等(《后汉书·方术列传》注)。

谶纬的神学本质,主要表现在它所宣扬的神学内容。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》注:“谶,符命之书也……而为王者受命之徵验也。”故谶书又称“符命”、“符书”。王莽一伙所造的谶文,就叫“符命”。“大归言莽当代汉有天下云”(《汉书·王莽传》),就是说王莽代汉是受命于天的。刘秀即位告天文引谶曰:“刘秀发兵捕不道,卯金修德为天子。”(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》)用以说明他当天子,是天帝在谶文中早就注明了的。刘秀在封禅文告中还六引谶文,用以证明他封禅是天命决定的(详见《后汉书·祭祀志上》)。

纬书也是讲上天符命的,不过在形式上通过孔子所预言的。如《后汉书·五行志》注引《春秋潜潭巴》三十三条,全是说明某日日蚀,就是上天向人君预示某种变乱,天人感应的神学气味十分浓厚。

公案之刺史。昔于天武夫四其言当曲，武祖氏人非，虽更聘翻，立而，皇帝以尊，人臣蒙乘，不天皇二宜帝对“要共”。由昔兴夏当刃督友从《诗孟卦·牛马》”。命天飘承刈，武王二周鼎取，里百姓自服

谶纬神学起源于何时？东汉大思想家张衡曾说：

谶纬书始出，盖知之者寡。自汉取秦，用兵力战，功成业遂，可谓大事，当此之时，莫或称谶。若夏侯胜、眭孟之徒，以道术立名，其所著述，无谶一言。刘向父子领校秘书，阅定九流，亦无谶录。成、哀之后，乃始闻知……

大观庭中又言“别有益州”。益州之置，在于汉世。其名三辅

诸陵，世数可知。至于图中论于成帝……至于王莽篡位，

汉世大祸，八十篇何为不戒？则知图谶成于哀、平之际也。（《后汉书·张衡传》）

张衡这两段话，从西汉的学术发展和谶纬内容两方面，说明了谶纬神学起源于西汉的成、哀之后。

从学术思想发展，张衡讲了两点理由。第一，是夏侯胜、眭孟的著作，没有一句讲谶纬的话。夏侯胜见于《汉书·夏侯胜传》和《汉书·儒林传》。他曾从夏侯始昌“受《尚书》及《洪范五行传》，说灾异”。昭帝时为《尚书》博士。宣帝时为太子太傅，“受诏撰《尚书》、《论语说》”。他的著作虽有浓重的阴阳五行论的神秘色彩，但毕竟是解经的著作，不同于纬书。眭孟见于《汉书·眭孟传》和《儒林传》。他略早于夏侯胜，曾“从嬴公（董仲舒高足弟子）受《春秋》，以明经为议郎，至符节令。”昭帝元凤三年（公元前 78 年）正月，泰山莱芜山南有大石自立，上苑林中枯柳复生，有虫食树叶成文字“公孙病已立”（《汉书·昭帝纪》）。“孟推《春秋》之意，以为石柳皆阴类，下民之象，泰山者岱宗之岳，王者易姓告代之处。今大石自

立，僵柳复起，非人力所为，此当有从匹夫为天子者。故废之家公孙氏当复兴者也。”并要“汉帝宜谁差天下，求索贤人，禅以帝位，而退自封百里，如殷周二王后，以承顺天命。”（《汉书·眭孟传》）从这件事来看，他的思想同西汉今文经学家董仲舒的哲学思想是相通的，这同谶纬神学也是有区别的。

第二点理由是，刘向父子领校秘书、阅定九流，未见谶纬。据《汉书·艺文志》载，刘向在成帝年间受诏领校《五经》等。刘向去世后，哀帝初年刘歆继承父业。刘向父子所校六艺、传记、诸子、诗赋、术数、方技，后由刘歆总为《七略》，并分诸子为儒、墨、道、名、法、阴阳、纵横、杂、农、小说等家，这可从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窥见大略。从班固根据《七略》修成的《汉书·艺文志》看，其中没有谶纬的类别，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及七纬的书名、篇名，也未见到。大抵又

张衡从谶纬神学内容方面讲了三点理由。第一，谶书中有益州的记载，而益州建置于汉武帝元封二年（公元前109年）。图谶有益州的记载，证明图谶成书是在汉武帝置益州之后。第二，图谶中关于“三辅诸陵世数”，最近可以考知的是汉成帝，图谶既有汉成帝陵墓的记载，证明图谶成书于汉成帝死后。第三，图谶中对王莽代汉没有戒告，而王莽代汉是西汉后期的重大事件，可见图谶成书于王莽代汉以前。又《牛山》受“昌黎”之变从曾山。《班林》附《牛山》尚

张衡是东汉“通《五经》，贯六艺”（《后汉书·张衡传》）的名儒，又是东汉最杰出的自然科学家。在哲学上他是谶纬神学的激烈反对者，对谶纬神学应该是了解的。关于西汉经学和最早出现的谶纬神学的资料，他比后人也见得多。因而，张衡关于谶纬产生于西汉成哀之后的看法，基本上是可信的。今许群至，相类大登即相字文《汉书·李寻传》关于谶书出现的最早年代的记载，较张衡所说的时间略早。它说：“春《卦孟》”。（《景帝纪·卦好》）“立昌陵，葬公自昌太令。公文升吉，授昌陵王，公文宗昌陵山泰，公文弱可，类阳

初。成帝时，齐人甘忠可诈造《天官历》、《包元太平经》十二卷，以言“汉家逢天地之大终，当更受命于天，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”。忠可以教重平夏贺良、容丘丁广世、东郡郭昌等。中垒校尉刘向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，下狱治服，未断病死。（《后汉书·李寻传》）

哀帝即位后，夏贺良通过李寻、解光、郭昌等人推荐，甘忠可制造的谶纬被哀帝接受。汉哀帝还以此在建平二年（公元前5年），导演了一次改元易号的闹剧。《汉书·哀帝纪》说：“待诏夏贺良等言赤精子之谶。”《汉书·王莽传》也说：“甘忠可、夏贺良谶书藏兰台。”可见，甘忠可所造的书就是最早出现的谶书。根据这条史料，我们可以说谶纬神学产生的确切年代是成、哀年间。

《汉书》的记载，似乎同张衡的观点是矛盾的。一是张衡讲刘向父子“阅定九流，亦无谶录”，但《汉书·李寻传》明确讲刘向在成帝时，“奏忠可假鬼神罔上惑众”。哀帝初，刘歆也认为甘忠可的谶书“不合《五经》”。可见刘向父子在校书前或校书过程中是见到过谶书的。但张衡又说刘歆校定的书目，没有谶书。从《汉书·艺文志》看，确实如此。这好像说不通，其实并不矛盾。刘向父子见到过谶书，校书时又没有记录，二者都是事实。因为刘向父子是坚决反对甘书的。同时谶书始出，数量太少，专列一项不大可能，附于别的项类，又似不妥。这两种原因都有可能使刘歆见到谶书，而又未把它列入所校书目内。

第二点矛盾是，张衡讲谶纬在“成、哀以后乃始闻之”，“成于哀、平之际”，但班固的《汉书》记载是成帝时甘忠可已造出谶书，时间上明显不合。但这也并非不可解决的矛盾。首先，成、哀、平是三代相继的国君，成帝在位二十一年，哀帝只有六年，平帝只有五年，在时间上两种说法差异不大。其次，成帝时，甘忠可被下狱病

死，夏贺良被杀了头，推荐谶书的李寻等也差点送了命。谶书虽然已经出现，但由于被当政者视作“违经背古”的妖书，因而它不可能在社会上广泛传播，知道人的自然很少。哀帝后，王莽实际上控制了西汉王朝，适应王莽代汉的需要，谶纬神学大肆兴起，知道的人才多起来。因而张衡的说法和班固的记载，我们可以这样来看，即最早的谶书成于成、哀年间，而作为一股社会思潮，谶纬神学则兴起于哀、平之际。

谶纬神学产生于成、哀年间，绝非偶然，既有思想根源，又有社会根源。从甘忠可的“汉家逢天地之大终，当更受命于天”的话来看，它是西汉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家的天命论与阴阳五行说合流的产物。从“天帝使真人赤精子教此道”看，显然是秦汉以来方士思想的影响。

除了思想原因，更重要的是当时社会矛盾的反映。成、哀年间，除了繁重的赋税、徭役外，各级官吏和豪强地主兼并土地的现象也十分严重。成帝在诏书中说：公卿、列侯、近臣“广务第宅、治园地”（《汉书·成帝纪》）；哀帝在诏书也说：“诸侯王、列侯、公主、吏二千石及富民多畜奴婢，田宅亡限。”（《汉书·哀帝纪》）许多农民由于丧失土地，变成了“流民”。他们连最起码的生活也得不到保障，“民有七亡而无一得”，“民有七死而无一生”（《汉书·鲍宣传》）。于是，农民起义便在各地相继暴发，农民与地主的矛盾空前激化。当时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，特别是刘氏集团与王氏集团之间的矛盾也很尖锐。整个社会处于严重的危机之中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或为了挽救西汉灭亡，或为了夺取刘氏的政权，都需要一种新的思想武器，谶纬神学正是适应这种政治的要求，便在吸取西汉今文经学与方士迷信的基础上应运而生了。

曰《堯幹贊》。封万岁公，命受封符命，曰《堯肅贊》。成公立，帝奉承黄，承太素正。步金輿漢上三辛大歲西臘。金輿乙，守太西。玄文子首自爻。掌王其事。为王外而，尊百次大歲西臘金。黄輿白而吉。从西汉末年到东汉末年，谶纬神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。从甘忠可制造谶书到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，是谶纬神学发展的第一阶段；从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到东汉王朝灭亡，是谶纬神学发展的第二阶段。在这两个发展阶段上，谶纬神学具有不同的特点。

在第一阶段，谶纬神学是各种政治势力相互斗争的思想武器，尚未法定地统一起来。王莽、刘秀、公孙述等政治力量，都根据自己的需要，制造和利用谶纬。王莽以“告安汉公莽为皇帝”的谶文，做上了假皇帝。两年后“广绕侯刘京、车骑将军千人扈云、大保属臧鸿奏符命。京言齐郡新井，云言巴郡石牛，鸿言扶风雍石，莽皆迎受”。王莽又以此为根据，正式取代了西汉王朝。“是时争为符命封侯，其不为者相戏曰：‘独无天帝除书乎？’”王莽鉴于此，曾一度企图将谶纬统一起来，专门为他服务，在公元九年，“遣五威将王奇等十二人班《符命》四十二篇于天下。”并且宣布“非五威将率所班，皆下狱。”但是，由于王氏政权尚不稳固，相应地思想统治也不稳定。王莽班《符命》后，甄寻制造谶书同王莽进行争权的斗争。其后，更有李焉与卜者王况等制造谶文，预言“汉家当兴”（以上均见《汉书·王莽传》）。可见，王莽在实际上并没有把谶纬真正法定地统一起来。

其后，刘秀根据“刘秀发兵捕不道，卯金修德为天子”的谶文，登上了皇帝宝座。当时，公孙述也引用谶纬证明他是真命天子，并同刘秀作斗争。《后汉书·公孙述传》曰：“述亦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，妄引谶记。以为孔子作《春秋》，为赤制而断十二公，明汉至平帝十二代，历数尽也，一姓不得再受命。又引《录运法》曰：‘废昌

帝，立公孙。’《括地象》曰：‘帝轩辕受命，公孙氏握。’《援神契》曰：‘西太守，乙卯金。’谓西方太守而乙绝卯金也。五德之运，黄承赤而白继黄，金据西方为白德，而代王氏，得其王序。又自言手文有奇，及得龙兴之瑞。数移书中国，冀以感到众心。”刘秀对此也很害怕，还专门给公孙述写信，对谶文作出不同解释。

在这个阶段上，谶纬神学的第二个特点是，谶纬的制造者和宣扬者主要是方士和投机政客。最早制造谶书的甘忠可是方士，王莽时有卜者王况、道士西门君惠（见《汉书·王莽传》、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》），都是方士。此外，制造谶纬的还有孟通、刘京、扈云、臧鸿、哀章、甄寻、张永、蔡少公等，这些人大都是投机政客。儒生制造谶纬的，只有华强曾造作《赤伏符》（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》）。信奉图谶的有《易》经博士苏竟。刘歆虽是王氏集团的重要成员，但并未有他制造或宣扬图谶的记载。相反地，激烈反对甘忠可所造的谶书，倒是史有明文的。可见，在这个阶段，儒生制造和宣传谶纬的是极少数的。

在这个阶段，谶纬神学的第三个特点，就是比较粗陋。尹敏在受诏校定图谶后曾说：“谶书非圣人所作，其中多近鄙别字，颇类世俗之辞。”（《后汉书·儒林传》）从现存资料来看，王莽、刘秀、公孙述等所引谶文都是很短小的，他们的拥护者所造的谶文也是如此。这个阶段上人们所引谶文均不见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和七纬的书名。可见，这时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和七纬还未成书。

建武十一年（公元35年），刘秀统一了全国。随着刘氏政权的逐步巩固，思想上的统治也加强了。谶纬神学在刘秀夺取政权的斗争中，虽是有力的思想武器，但谶纬神学又具有危险性，特别是在社会动乱年代，一切人都可以利用它来为自己服务。王莽已经看到了这一点，曾力图统一谶纬神学。刘秀同样懂得这一点，所以很重视将谶纬法定地统一起来。据《后汉书·儒林传》载，“帝以（尹）敏博通经记，令

校图谶，使蠲去崔发所为王莽著录次比。”又载：薛汉在“建武初，为博士，受诏校定图谶。”可见刘秀在统一全国过程中，就已开始注意谶纬的统一问题。

中元元年（公元 56 年），光武帝“宣布图谶于天下”（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》）。如果尹敏、薛汉是在建武二年受诏校定图谶的话，到这时正好三十年。所谓“校定”，校只是次要的，定才是主要的。就是说薛汉等人受诏校定图谶的主要任务，就是制定为东汉王朝服务的统一的谶纬神学。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和七纬就是经薛汉等人之手，成于这个时期。

这从《后汉书·祭祀志》中也透露了一点音讯。“建武三十二年正月，上斋，夜读《河图·会昌符》。”二月，刘秀在封禅文告中引用《河图·赤伏符》、《河图·会昌符》、《河图·合古篇》、《河图·提刘予》、《洛书·甄曜度》、《孝经·钩命决》。这是《后汉书》中最早注明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及其篇名的地方。恰好在这一年，刘秀宣布图谶于天下，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。从中我们可以看出，第一，《河图》等纬书成书的最迟年代是建武三十一年，即公元 55 年。第二，薛汉等人所造《河图》等书，吸收了以前为刘秀服务的谶纬，但又把它发展得更精巧更神秘了。如华强曾造《赤伏符》说：“刘秀发兵捕不道，卯金修德为天子。”而《河图·赤伏符》则曰：“刘秀发兵捕不道，四夷云集龙斗野，四七之际火为主。”很显然后者是在吸收前者的基础上，发展而成的。第三，《河图》等是由刘秀钦定，并抬到法典地位的。刘秀夜读《河图》等，实际上是审定谶文。他在封禅文告中宣布“皇帝唯慎《河图》、《洛书》正文”，随后又宣布图谶于天下，就是皇帝出面把谶纬抬到国典的地位。

在这个阶段上，谶纬神学不仅相当精巧，而且被法定地统一起来了，成为东汉王朝的统治思想。此时，谁敢擅造图谶，就是大逆不道，一旦被发现，难免杀身之祸。楚王刘英是刘秀的儿子，明帝永平十五年（公元七十年），被告发“英与渔阳王平、颜忠等造作图书，有逆谋。”结果以“大逆不道”的罪名被废，不久自杀（《后汉书·光武十王传》）。

谶纬神学在这个阶段上的另一个特点是,不少经学家和儒生都是谶纬神学的热烈信奉者。据《后汉书》载:《易》经博士苏竟“善图谶”。(《苏竟传》)《韩诗》博士薛汉“尤善说图谶灾异。”(《儒林传》)博士郭凤“亦好图谶。”兼明《五经》的樊英“又善风角、星算,《河》、《洛》七纬。”(《方术列传》)博士邵仲、曹褒也善图谶(《党锢列传》)、《曹褒传》)。沛献王刘辅“善说《京氏易》、《孝经》、《论语》传及图谶”(《光武十五列传》)被称为关西大儒的法真亦“通内外法典”。(《后汉书·逸民列传》)四世传《诗》的翟酺“尤善图纬”,并作《援神解诂》、《钩命解诂》(《翟酺传》)。杨统教授三千门生,他祖孙三代都“善图谶学”,杨统著有《内谶解说》(《杨厚传》)。此外,东汉经学大师贾逵、班彪父子、马融、郑玄等人,也无不深受谶纬神学的影响。

由于东汉的儒生一般都信奉谶纬神学,不少经学家都以谶纬作为解释儒家经典的依据,使经学神学化。据《儒林传》载:景鸾“作《易说》及《诗解》,文句兼取《河》、《洛》。”李育认为“前世陈元、范升之徒更相排折,而多引图谶,不据理体。”后来,贾逵以图谶为据,说:“《五经》家皆无以证图谶明刘氏为尧后者,而《左氏》独有明文。”使《左氏春秋》立于学官(《贾逵传》)。从东汉名儒丁恭学《公羊严氏春秋》的樊儵,“与公卿杂定郊祠礼仪,以谶正《五经》异说。”(《樊儵传》)明帝时曹充上书,建议另制汉礼,其中一引《河图》,一引《尚书纬》作为依据,明帝“善之”。他儿子曹褒受诏撰汉仪时,也“杂以五经谶记之文。”(《曹褒传》)马融“集诸生考论图谶,”以图谶作为儒生教学的内容(《马融传》)。章帝建初四年,召开的白虎观会议,实际上是一次以谶纬统一五经的会议。

原载《中国哲学史研究》1984年第1期
“。斯臣等蒙忠懿,平王固深已英”文者,。平十。元公平
。(持王十。张·牛对言)杀自入不,我封治罪。重不。大“以果系